

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特点的探讨

娜日斯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周边国家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鄂尔多斯学, 在“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的呼唤中应运而生。它如何肩负历史的责任? 是否能够科学的构架体系和结构? 其决定因素是科学的方法论。何谓它的科学方法论? 这是本文立论的初衷。本文理论建立在“把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看作是一——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的新发展观之上, 试图以蒙古文化为鄂尔多斯学的主体文化特征的理论, 探讨“鄂尔多斯文化”形态的历史特征性, 从而阐述鄂尔多斯学的学科隶属关系及其与蒙古学的关系, 并对鄂尔多斯学的这一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哲学思考。为鄂尔多斯学提供方法论的思考。

关键词: 鄂尔多斯文化; 蒙古文化; 鄂尔多斯学与蒙古学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温斯顿·丘吉尔有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 为这么多的人, 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肩负着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大任, 鄂尔多斯学迈着时代的步伐, 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是蒙古学中突起的一支先锋劲旅。

一、关于鄂尔多斯学概念与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考

鄂尔多斯学, 在“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的呼唤中应运而生。是顺应时代的, 是客观要求的新生事物, 它是时代的产物。大凡冠以新生事物, 它的产生肯定是合理的。但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科学的验证? 这个问题的保障取决于其方法论之上。我们知道, 任何学问必须基于确定的对象、是对确定对象的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概括和总结, 从而是寻求它内在的规律性的研究。同时我们知道, 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 必须遵循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不断成熟的总结的、科学发展所提供的科学的方法。不然我们就会走弯路, 就会丧失新生事物的历史使命。

(一) 鄂尔多斯学的理论必须坚持新发展观

现今中国大地,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涌现出“地域学”的温州学、扬州学等新生事物。其背景起源于它们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其实质是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主体“人”。我们在理论上坚持这样的观点: 只有把具有内在自然秩序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而不仅仅视作是一种手段, 才有可能准确地揭示经济和社会规律。特定的文化所决定的价值系统和道德秩序一经形成, 便成为市场经济自然秩序内在成分。这一“市场经济不仅需要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的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冷静地和深入地分析“鄂尔多斯文化”, 以期在整体上和根本上寻找鄂尔多斯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所做出的选择必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规范。同时,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鄂尔多斯在旧有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合机制、伦理道德等都产生了复杂的变化。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在鄂尔多斯文化土壤里得到更好的发展是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关键问题。我们知道, “鄂尔多斯文化”作用影响和形成“鄂尔多斯人”的价值信条创造活动的规范, 通过文化所特有的遗传机制已经代代相传, 形成了一个巨大深厚繁荣历史积淀和存量。它规范了“鄂尔多斯人”的思维模式、塑造了“鄂尔多斯人”的特殊精神。这一历史积淀是如此巨大, 在改革的每一步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我们必须回答“鄂尔多斯文化”将会对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与构架产生什么影响? 进一步讲, 在鄂尔多斯文化背景中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是本文所诚恳的向鄂尔多斯学提供的主要的理论思考所在。

我们必须坚持新发展观。在“鄂尔多斯文化”背景下，“鄂尔多斯人”，坚定地、卓有成效的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自己的脚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试图论证在鄂尔多斯建设和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以《鄂尔多斯学研究》为载体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文化研究者必须在“经济发展热”中保持冷静，清晰透视各类现象的本质。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手段，凭借这种手段定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却忽略了重要一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诸类因素的交融交互作用。不注重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些共同表象——经济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竞争等。我们应当去探究隐含这些共同表象之下深层的一个决定因素，即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所由此产生的内在经济技术条件与人文条件。

在理论上，战后几时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因为，原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重点放在资本、技术等经济因素定量化的分析上，这虽然是发展经济学最突出的方面，然而也正是这一点误入歧途。如何依靠价格机制与市场经济体系来塑造经济发展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均排斥于外，舍弃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复杂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经济和主体只作为“经济人”出现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的行为”。这种分析方法明显地缺乏对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人”的全面考察研究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透视。关于市场经济的人文条件问题，许多经典作家都做过精辟的论述。约翰·泰勒明确地指出，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是市场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基础。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等代表作中贯穿了这一基本思想，理性精神与物质质料都是发展中不可缺一的因素。在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和动机力量的情况下，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条件也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理性的经济目的。

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里，文化被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利益集团共享的公共物品或人力资源，它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没有文化作用，人们之间的分工与交易将变得不可能。J. 布坎南指出，文化进化已经形成或产生了非本能行为的抽象规则。

因此，文化因素对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得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将产生不同社会环境的市场经济，并且表现了不同特色的自然秩序。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精神要素作为有形制度体系的基础，市场经济极其发展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也就是说，要想准确的揭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必须认识具有内在自然循序的市场经济及其运行和发展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过程。我们只有坚持这一理论性，注重对“鄂尔多斯文化”的基本特质进行分析，并且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中，并将当代市场经济置于“鄂尔多斯文化”中考察。“鄂尔多斯现象”不只仅仅是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鄂尔多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过程。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坚持的理论观点，为确立鄂尔多斯学的方法论，确立它的学科隶属关系，方可探究它的文化品质及其特征。

（二）“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概念特征

针对鄂尔多斯学的方法论的问题，本文有必要首先对“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进行界定。“鄂尔多斯文化”有关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鄂尔多斯文化”指反映“鄂尔多斯人”存在时空的事与物和它们存在形态特性。凡从“鄂尔多斯人”存在以来，他们的历史与现实的、物质与精神的和他们存在与发展形式与方式的反映和表达都属于“鄂尔多斯文化”。狭义的“鄂尔多斯文化”是指“鄂尔多斯人”创造出的精神、思维形式与方式、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特点，也就是“鄂尔多斯文化”品质特性。

“鄂尔多斯现象”个狭义而特定定量性的概念，系指“鄂尔多斯文化”特定时空、特定事物的特殊状态。具体地说，“鄂尔多斯现象”是跨世纪时期鄂尔多斯地域的经济的快速增长状态。前者，主体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更重要的是主体；在广义上它表达“鄂尔多斯人”所存在的、以他为核心的、相联系的，囊括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的、有形与无形的东西，他所存在与发展的特质形态。具有相对无限的时空性；或者它在狭义上表达的是“鄂尔多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出的精神，各个不同特性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后者是指经济现象，人虽是经济现象的主体，但侧重在某种现象，而且是重心在地域经济发展现象之上，特指特定时期特定地域（鄂尔多斯地域）

经济发展状态。特征是相对有限性。

但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现象”不处在一个层面上。作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的鄂尔多斯文化，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人文问题。用最简单的概括描述二者的特征与关系，显然，后者是个“点”，前者是个“面”。“鄂尔多斯现象”这个“亮点”，亮丽的闪烁在“鄂尔多斯文化”这个“面”上。以“点”带面、还是以“面”带点，都不妨是个选择，诚然，“点”与“面”的统一是它们的实质，是我们的方法论的原则。这就说明，“鄂尔多斯现象”是“鄂尔多斯文化”的反映，是“鄂尔多斯文化”反映出来的一种状态。“鄂尔多斯现象”的母体是“鄂尔多斯文化”。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辩证法提供的科学方法。我们将二者联系起来，透过“鄂尔多斯现象”透视“鄂尔多斯文化”。以目的为方法论，对特定发展主体的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进行透视。这就是本文最终所坚持的方法论，对经济发展中的“人”的全面考察以及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透视。这是鄂尔多斯学建立的意义所在，鄂尔多斯学的方法理论要建立在这一对历史补充的当代经济学发展论之上。

鄂尔多斯学，是在“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的呼唤中诞生，并且试图驾驭它们二者。“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这两个概念是鄂尔多斯学所诞生的基因，其本身实际上已经明示了“鄂尔多斯学”的使命和“鄂尔多斯学”的方法论。“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就是鄂尔多斯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最好的表达。基于“鄂尔多斯文化”，研究“鄂尔多斯现象”及其不同时期的“鄂尔多斯现象”的学问就是鄂尔多斯学。在进一步的抽象概括，鄂尔多斯学就是研究鄂尔多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学问。

以上的结论与推论中，出现以下两个必须阐述的重要问题：一、“鄂尔多斯人”的概念问题；二、“鄂尔多斯文化”特征问题。

本文严格的讲，将论述前提概念设置在狭义的“鄂尔多斯文化”意义之上，而着重就“鄂尔多斯文化”品质特性而论。在“鄂尔多斯文化”品质特性意义之上探讨其与蒙古学的关系，阐述本文对“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及其建立鄂尔多斯学的认识，试图对狭义的“鄂尔多斯文化”进行哲学思考的同时，寻找它内在的发展规律。

（三）“鄂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概念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包括文化都将存在其主体性问题。本文所论的“鄂尔多斯文化”，其主体是以“（蒙古）鄂尔多斯人”创作的“鄂尔多斯文化”是蒙古文化，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在特定的时空中在塑铸了的文化。“鄂尔多斯文化”的形态及其特性在该区域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所决定。

1. “鄂尔多斯人”的主体是蒙古人

“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性的概念。“鄂尔多斯文化”的原创是蒙古人创作的蒙古文化。

“鄂尔多斯”作为历史性的概念而产生和存在，“鄂尔多斯人”也是作为历史性的概念而存在。有了蒙古人，方有人被命名为“鄂尔多斯人”，方可能产生鄂尔多斯文化，三者历史逻辑的统一性之中存在。为此我们需要借助于语言学和历史学家的论述。“鄂尔多斯”词源于蒙古语的“斡尔朵”，系指宫帐群落。成吉思汗时期是专用名词，大汗之宫殿。“鄂尔多斯人”这个概念的历史起源是来自蒙古族的“鄂尔多斯部落”。确切的讲，今天定位的鄂尔多斯概念，源于13世纪蒙古部落——鄂尔多斯；以“鄂尔多斯”为名落籍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鄂尔多斯部落”是由元代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从成吉思汗麾下八位将领的后代中抽调组成鄂尔多斯部落。鄂尔多斯部落，是个特殊的部落，它的使命与生具有，这就是守护“祭祀圣主成吉思汗的圣陵”。

历史有了“鄂尔多斯部落”，从而有了“鄂尔多斯人”的概念。蒙古鄂尔多斯人，他们是该地区的主体民族和主要人群，尤其是强势文化形态的载体和创造者。自然，他们文化的强悍性和与生具有的强势形态性，尤其他们的文化品质具有的特性，必然是这个地区文化的主宰者，占据主要位置。他们独特而强悍的文化及其影响力，必然形成这个地区的文化及其以后文化的主体性。它不仅是个地区的文化形态的原创、创造者，而且是个地区文化的建树者。因为在这个区域，历史以

来没有出现过，比它更强悍的民族及其文化。正因为如此，方将这块地域命名为“鄂尔多斯”。今天我们的版图方出现的“鄂尔多斯”地域及其文化，正是“（蒙古）鄂尔多斯人”和他们创造出的“鄂尔多斯文化”所决定的。

2. “鄂尔多斯文化” 原创是继承、弘扬了蒙古传统文化

蒙古人是“鄂尔多斯文化”的原创载体，更重要的是发展主体。这一立论自然可推理出，鄂尔多斯主体或传统文化与蒙古主体或传统文化是具有一致性、同一性，并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蒙古学界公认，蒙古文化隶属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文明。蒙古学学者们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做出了精辟的总结，其特点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蒙古族的一切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心理习惯、社会乃至风俗习惯性由它所规范和统驭。”“在流动中求自由和谐的社会意识、求实性与开拓性的相统一的社会人格，选择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社会心理。”这些正统、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每一个人的日常意识和行为信条，英雄主义精神、礼法意识、竞争意识、诚信商业伦理、进取精神等蒙古族文化精神的合理内核在“蒙古鄂尔多斯人”完全继承下来，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与其特殊的部落文化产生的特殊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庄严和崇高感相结合，这一“蒙古鄂尔多斯人”创造的“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蒙古鄂尔多斯人”及其“多元鄂尔多斯人”的代代相传和沉淀中，在各类文化冲击中和互动中作为文化机制核心，形成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

“鄂尔多斯文化”是现有的鄂尔多斯地域发展史上特定阶段产生发展而来的，它的文化渊源关系隶属是蒙古学，在蒙古学中完全可以得到全面而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鄂尔多斯学隶属蒙古学合乎逻辑一致性。由“鄂尔多斯人（蒙古人）”起源和形成了“（蒙古）鄂尔多斯文化”。这是现今“鄂尔多斯文化”的源头。这一观点是本论的基础理论，不仅如此，本论认为，“蒙古鄂尔多斯文化”不仅只作为源头、原创形态而存在，而且，它源源不断的在这块土地上塑铸着这一主体文化，以主人的威严感、崇高感和责任感，尤其是特殊的部落文化产生的特殊历史使命感，在长期的迁徙和文化的冲突中，尤其是在人类最艰苦的斗争，生存斗争中，相传和弘扬了他们原创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历练出了他们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

鄂尔多斯文化的主体与特性，即传承了本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及行为模式。长生天赐予蒙古人异秉天赋，草原赋予蒙古人博大的胸怀。在各类文化冲击中，“鄂尔多斯人（蒙古人）”、“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坚守中塑铸着它！它原有的品质丝毫未改变。吉日格勒博士对游牧文明的总结中的关于文化的发展观值得借鉴，他认为，任何一个现代化，都是在给定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思想材料基础上建立的。在战争或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文化会受到冲击和挑战，但文化终究会经过调适而恢复其常态和惯性。

科学告诉人们，优胜劣汰。文化也同样，“强者为王”，强悍民族性格自然要表达出强悍的文化品格，并占居主体位置。可以这样说，这些优秀文化品质所表现出的社会意识、民族心态凝聚成为一触即发能量。它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处于文化低层的动力源泉。它必将在文化融合中成为当代鄂尔多斯特有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合理成分及推动力。这可能就是之所以命名为“鄂尔多斯学”的初衷。

3. “多元的鄂尔多斯人” 与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

显然“鄂尔多斯蒙古人”是从文化形态的原创和主体性的视角而论的。换个视角，“多元的鄂尔多斯人”是与“鄂尔多斯蒙古人”共同缔造了“鄂尔多斯文化”。

历史的看问题，“鄂尔多斯蒙古人”入住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当时和后来都不仅是单一性的人群与民族存在着，也就是说，“鄂尔多斯蒙古人”形成时就已经与其它民族共同存在。其它民族的文化均各自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它们虽不比强悍民族创造出的文化强悍，但各自的族群以自己的独有特性存在，他们的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全方位的影响下改变和发展着，特别是他们同时与强悍文化互动着，吸取着蒙古文化的同时被蒙古文化汲取着。

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及其农耕文化蕴藏的“务实性，精细”等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及其文化都被

合成在原创的“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文化”之中，“多元鄂尔多斯人”吸取而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因此，这里的人们不论汉族还是蒙古族，他们的社会性格和行为模式非常类同。尤其汉族，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逐渐的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与蒙古文化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文化方面的有着深刻的共同点。

历史就这样形成了“多元的鄂尔多斯人”，他们共同创造出了“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并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着这一以蒙古文化为主体性的或为文化核心的鄂尔多斯文化。

二、“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的历史沿革性

“鄂尔多斯文化”的特征，自原创的“鄂尔多斯文化”开始到今天，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鄂尔多斯文化”的原创形态是蒙古文化品质的继承和发展。

“鄂尔多斯文化”的精髓与蒙古文化的精髓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弘扬了这一优秀文化品质。“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继承蒙古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习惯、行为模式，乃至风俗习惯性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概括“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思维形式与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上表现出，追求和谐、开拓进取、诚信、包容，富有历史的责任与使命感等特点。这一强悍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交融、汇同过程中终究要占居和保持着其地域文化的主体性，而融合、吸取其它文化的营养，从而形成鄂尔多斯不同时代和时期的社会文化底蕴，孕育和造就不同时代与时期的鄂尔多斯文化。

第二，“鄂尔多斯文化”是多民族优秀品质的融汇。

“鄂尔多斯文化”继承蒙古文化的精髓的基础上吸取了汉民族农耕文化的优秀品质。我们在前面已阐述，“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同时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把事物放在它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要历史的看问题的同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历史上，汉民族农耕及其文化走进了“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文化”之中，今天的“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经历了历史的融合、汇通，经历史的融合成为“多元鄂尔多斯人”和“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

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蕴藏的“务实性、精细、团结”等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等都被合成在原创的“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文化”之中，“合成的鄂尔多斯人”吸取而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多元文化的集成。这就是说，“鄂尔多斯人”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继承、弘扬了蒙古文化的精髓的同时，吸取和集成了汉文化的优秀品质。

第三，“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与历史性。

以蒙古文化为主体的鄂尔多斯文化，再发展到现代“鄂尔多斯人”与“鄂尔多斯文化”，三个历史阶段性的形态中，尤为突出的是它的现代性。“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的历史界定，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它与生具有的原始基因，“追求‘新’的创新性”、“开放性思维方式，开拓性的行为模式，真诚、诚信的社会心理”，加之“鄂尔多斯蒙古人”“鄂尔多斯蒙古文化”的特殊性，“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化，它们与以汉民族为首的“精细、务实、团结精神”的汇同，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新时代的呼唤中升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和经济迅速发展为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的全方位表达提供了可能的历史条件，“创新开拓，勇为天下第一；务实求实，团结协作，追求时尚”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必然成为当代“鄂尔多斯人”创造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鄂尔多斯蒙古文化”底蕴与驱动力。

“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的历史性是说它的阶段性特征，即沿革性问题。也就是“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特征。“鄂尔多斯文化”是以蒙古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这是它第一个形态；它第二个形态是合成性为特征，合成的多元鄂尔多斯文化品质，“进取、务实求实、团结协作”的以汉民族为首的农耕文化融汇到蒙古文化的“鄂尔多斯文化”中，多元文化的鄂尔多斯人创造出“多元鄂尔多斯文化”；它第三个形态是“现代鄂尔多斯人”再次将“多元鄂尔多斯文化”升华为“现代鄂尔多斯文化”，“创新开拓，勇为天下第一；务实求实，团

结协作，追求时尚”的文化特征。

第四，鄂尔多斯文化本质的发展性。

“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性是说其一个从本质上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品质。它的文化品质是积极向上的，充满活力的，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品质。历史唯物主义清晰的告诉我们，“人”、尤其“民族”是历史产物。因历史诸方面的原因，游牧文明的蒙古鄂尔多斯人，与农耕文明的人民融合，两种文明汇通，交织、升华出今天人们认识的鄂尔多斯人。同时历史唯物主义明确的告诉我们，游牧文明的集中代表者，蒙古文化的精髓铸就了“鄂尔多斯文化”的脊梁与躯体，为农耕文明的集中代表者，汉文化输血，造就了今天的现代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

“鄂尔多斯文化”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汇汉族等多民族文化，形成“多元鄂尔多斯文化”，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对蒙古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奥斯特罗姆，等.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 [M]. 北京: 商印书馆, 1992. 287—291.
- [2] J. 布坎南. 自由市场与国家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115, 116.
- [3]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蒙古族哲学思想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 4—16.
- [4] 娜日斯, 巴音吉日嘎拉. 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模式 [J]. 东北亚论坛 (4). 64.
- [5] 李尔赤金·吉尔格勒. 游牧文明史论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12, 87—97.

Erdos studies is the vanguand of Mongolian studies

Narisi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Researeh Institute of Mongolian Studies College, nner Mongolia , Hohhot, 010021)

Abstract: Erdos studies was born by the calling of “Erdos culture” and “Erdos phenomenon”. She how to shoulder historical nesponsibility? Ehether can establish scientific system and stracture on not and this anticol’s original intention. This antical’s theory based on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_the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_oriented economy regand as the process of human nealize own value. This antical try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feafuhes of “Erdos culture formation”, expound the relation of Erdos studies and Mongolian studies.

Key words: Erdos studies; Mongolian culture; Erdos studies and Mongolian studies

收稿日期: 2004-12-20;

作者简介: 娜日斯 (1956—)，女，蒙古族，辽宁省阜新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周边国家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蒙古国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